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张自忠



他的英勇坚毅，足为全国军人楷模。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周恩来

他是为中华民族打日本强盗而死，这正是中华军人应当死节的时候，这才叫“死得其所”，这种死是无比的光荣，无比的伟大！

——冯玉祥

抗日名将张自忠誓死报国，屡建战功，威震敌胆。1940年5月，在枣宜战役中，亲临前线，浴血奋战，大量歼敌。由于被敌军重重包围，寡不敌众，身负重伤，于16日壮烈牺牲。上面周恩来、冯玉祥的两段话，是对张自忠将军高度而准确的评价。

一、少年时代

张自忠的父亲叫张树桂，字冬荣，是山东省临清县人，家住在距县城30余里的唐园。有数百亩的田产，百余间房屋，是个殷实大户。

自忠的母亲姓冯，生下5个儿子，2个女儿。长子夭亡。按照张家的排名，“树”字辈下面，应是“自”字。故5个儿子的名字依次是：自清、自严、自忠、自明。

自忠生于1891年（清朝光绪十七年）8月11日（农历七月初七）。名字是父亲给起的。自忠是名，字是荃（kǎn）臣，乳名宝勤。自忠的父亲是个读书人，给儿子起名字是经过仔细推敲的。“忠”字的意思容易理解，“荃臣”的含义是“忠诚之臣”，所以“名”和“字”的蕴义是一样的。

那么，后来人们为什么把张自忠的字称为“荃忱”呢？这是因为自忠成年后参加了冯玉祥的部队，冯思想进步，反对名字带有封建色彩，凡官兵的名字有君臣、福寿、荣华富贵的字，他都要加以更改，张自忠当然也不例外，——“荃臣”改成了“荃忱”。

1897年，张自忠6岁时开始入私塾上学。后来，父亲到江苏省赣榆县做官，把他也带去了，又就教于家庭老师。张自忠小的时候就不爱说话，但好动，贪玩儿，爱打抱不平。在他15岁的时候，有一天在街上，看见一个无赖欺侮一个卖菜的老头儿。他跑过去对准无赖就是一拳。随后两人扭打起来。自忠虽还是个孩子，但身高力大，无赖不是对手，只得认输，给老头儿赔了礼，自忠才放他走。父亲见他不好好学习，怕他外出闯祸，就把他送回老家。不久，父亲因急病死于任上，全家非常悲痛，自忠更为没有听父亲的话，没有好好孝敬父亲而难过。

张自忠少年时代就同情弱者，帮助弱者。有时他与伙伴们赌钱玩儿，要是赢了穷人家孩子的钱，他一文不要；若是赢了有钱人家子弟的钱，就一文不能少。那时在农村，馒头是上等食物，只有富裕家庭才吃得上。每当他看到佃户们吃糠窝头，就拿馒头和他们换。每当麦收时，母亲常让自忠到田里看看。他一到田里，就坐在麦捆上，啥也不管。佃户们知道他心眼好，就让孩子们捡麦穗。有的孩子竟从他坐着的麦捆里抽麦穗，他听任孩子们抽，直到被抽得坐不住了，就坐到另一捆上去。

张自忠16岁的时候，与临清县咨议局议员李化南的女儿李敏慧结了婚。她没读过书，但十分贤惠。

1908年，张自忠考入临清县高等小学堂（相当于现在的中学）。在这里

学习的仍是以四书五经为主的“旧学”。所以，张自忠从小就接受孔孟之道及忠、孝、仁、义旧道德的灌输，其中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影响。他还经常阅读《三国演义》、《说唐》、《精忠说岳传》等古典小说，对关云长、岳飞和秦琼等的忠义品德、浩然正气，他非常敬仰，这对他后来所走的道路起了重要作用。

1910年，张自忠从高等小学堂毕业。这一年，他作了父亲，给儿子取名廉珍。这一年，张自忠19岁，进入青年时代了。

二、胸怀壮志 投笔从戎

1911年10月，爆发了武昌起义，全国掀起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

这年冬天，张自忠考进了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天津这个大都市使他眼界大开，北洋法政学堂的进步思想和革命气氛更使他深受鼓舞。在学校，他第一次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政纲。这些，对他后来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这年底，他秘密参加了同盟会，成为一名革命党人。

这时，济南有一所山东省法政专门学校，校长是同盟会山东省负责人。武昌起义后，他发起成立山东省各界联合总会，联合进步力量迫使山东巡抚宣布独立。张自忠出于对家乡的感情，转学山东省法政专门学校，并积极投身到山东省的革命运动中。

辛亥革命不久，原清朝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凭借他控制的北洋军事势力，依靠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并利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于1913年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中华民国虽然建立了，但仍然到处是贪官污吏，民不聊生，外国列强横行，无异于腐朽的清王朝。在学校里，张自忠经常对同学们说：“国家、民族到了今天这样的地步，我们还守着案头死读书，咬文嚼字地准备作刀笔吏，实在让人于心不甘。”辛亥革命的这种结局，使张自忠认识到要彻底推翻封建统治，建立共和政权，挽救民族危亡，赤手空拳、口头鼓吹是不行的，必须掌握武装力量，革命才能成功。因此，他开始萌发并逐渐坚定了参军的想法。

1914年暑假到了，张自忠说服了母亲，于这年初秋，和约好的5个同学奔赴奉天省（今辽宁省）新民县，到陆军第二十镇（师）第三十九协（旅）第八十七标（团）参军。这个标的标统（团长）是车震。

张自忠等6个人为什么千里迢迢从山东去奉天参军呢？因为第二十镇的很多官兵是山东人，车震则是临清县人，还是自忠三哥的朋友。更重要的是，第二十镇具有革命传统。辛亥革命时，曾举行兵谏，要求清朝政府召开国会，起草宪法；该镇的第七十九标的三名管带（营长）受同盟会指示，在滦州起义，成立“北方革命政府”。该镇另一名管带冯玉祥也参加了滦州起义，并被推举为起义军参谋长。

车震知道这6个年轻人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怕他们受不了部队的苦，劝他们回家继续求学。但他们是怀着满腔热血而来的，决心报效国家，怎么劝也不走。当时正值麦收，第二天，6个人去参加麦收。头两天还能坚持下来，可是麦收还没完，除张自忠外，那5个人就坚持不住了，要求退役。车

震劝自忠与他们一起回家，但张坚决要求留下来。车震见他决心很大，就给他补了个副兵的缺。

部队的生活非常艰苦，特别是士兵是苦上加苦。每天除训练之外，还有繁重的体力劳动，如修路、挖壕、抬煤、扛米等。初干这些重活，张自忠累得腰酸腿疼，肩膀都压肿磨破了。当他实在干不下去时，同棚（相当于班）的弟兄们便把他的活揽下来，长官过问，就以叫张自忠代他们写家信搪塞过去。车震见张自忠好像吃不消了，几次劝他早日回乡，继续未竟的学业。张自忠却咬紧牙关，坚持下来。

1915年初，车震升任第三十九旅旅长，该部奉命由新民县移驻绥远省（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平地泉。有一段路是徒步行军，士兵要全副武装，背负几十斤，日行百余里，疲惫不堪。宿营时，每人只有一条军毯，深秋的午夜，常常被冻醒。经过一年多的磨炼，张自忠经受了考验，意志更坚强了，也成熟了许多，对什么样的苦都能应付了。

1916年12月，袁世凯称帝，蔡锷等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次年初，第二十师奉命南下，镇压护国军。在护国军的打击下，车震部被击溃，几乎全军覆没。车震心灰意冷，解甲归田。大树已倒，张自忠无处安身，幸得几位同乡资助，才回到家乡。初次参军历时两年，就这样惨淡地结束了。但张自忠一腔热血，满怀壮志，决心再次投军。

车震了解张自忠的心思，也赏识他的意志和热情，想趁去天津办事的机会，把他介绍给驻军廊坊的自己的盟兄弟冯玉祥。

冯玉祥，字焕章，1882年生于直隶省（今河北省）青县。幼时因家境贫寒，入保定“五营练军”当兵。1902年投奔袁世凯的新军。由于他勤奋好学、埋头苦干、作风顽强，1910年任第二十镇某营管带，后又升任京卫军团长。冯玉祥打破当时一般军队因循敷衍的陈规，创造了新的练兵方法，培养造就了一批批优秀青年军官。1914年，冯玉祥部扩编为第十六混成旅，成为一支很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冯任旅长，驻军天津附近的廊坊。

1916年9月，车震把张自忠带到冯玉祥的驻地。冯听了老友的介绍，又见张身材魁梧，像个山东大汉，且显露出英武、沉毅之气，很是满意。

张自忠投奔冯玉祥，实际上是他军旅生涯的真正开始。

三、崭露头角 屡次提升

张自忠投奔冯玉祥之初，被委为中尉差遣，即见习官。不久，正式任命为排长。这年，张自忠已25岁了，而比他年轻，后来也是赫赫有名的战将佟麟阁、吉鸿昌、冯治安等，此时都是连长了。

1919年初，张自忠入军官教导团学习。冯玉祥经常对学员们说：“只有刻苦地学习，刻苦地训练，才能有救国救民的真本事。”张自忠牢牢记住了这句话，他勤奋学习，虚心求教，每次考试的成绩都名列前茅，因而得到教导团团长鹿钟麟的赏识，冯玉祥也称赞他“确是一个有用之材”。后来，冯提到张自忠这段经历时说：“在教导团中，他又做了一个标准的团员，当时鹿钟麟团长非常夸奖他。他非常勤学，对人处事都极其真诚友爱，又能刻苦耐劳，这时便显出他未来一定是个将才。”

张自忠在教导团学习半年结业，提升为连长。1920年初，委任他为旅部上尉副官。4月，调他为水上陆战队第二队队长。不久，又调到学兵连（由

学生出身的新兵编成)当连长。不到一年时间,他的职务换了六七次。在哪个岗位上,他都干得很好,出色完成了任务。他所带的连队,考试成绩经常是全旅第一,号称“模范连”。

张自忠纪律严明,当罚则罚。谁犯了纪律,做了错事,他毫不含糊,动起怒来,瞪圆眼睛,“败类”、“害群之马”,骂不绝口。每次还要带上一句:“看我扒了你的皮!”这样,他得到了一个“张扒皮”的浑号。一些人误以为张自忠粗暴、蛮横,只知惩戒。实则,张深知“治兵先治心”的道理,他是“严中寓恩”、“恩威并用”。以打军棍为例,不是滥施棍杖,遇过即打。他提出了八不打:有病不打,盛气不打,盛暑不打,饭前不打,无恩不打,罚过不打,夯兵不打,不知不打。衡量再三,很有分寸。

张自忠当排、连长时,能与士兵打成一片,相处无间。他经常与士兵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说笑话,拉家常,每个士兵的性格、特长、思想、家庭状况等,都了如指掌。士兵也不怕他,经常到他屋里翻箱倒柜,发现了钱或什么东西,便一抢而散。张自忠每月的薪饷几乎都用在士兵身上。他在连队设图书馆、俱乐部,购置运动器材。士兵生活上遇到困难,只要他手头宽裕,就说:“要多少,写个借条来。”有的士兵对他很了解,预先写好借条,然后再向他开口。这样“借”去的钱,自然都不须偿还。

1920年秋,冯玉祥旅成立了一个直属旅部的学兵队,下辖两个连。冯汉安任队长,兼第一连连长,张自忠任第二连连长。冯比张小5岁,1912年就在冯玉祥的部队当兵。冯待人诙谐风趣,张则是刚毅寡言。两人刚柔相济,配合默契。此后长期合作,私交甚厚,曾互为上下级。20年后,张自忠壮烈殉国前,张、冯分别是第三十三集团军的正、副总司令。

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属北洋军阀的直系。在直皖战争中直系取胜。1921年2月,冯奉命率部进驻陕西。不久,将第十六旅扩编为第十一师,兵力达3.5万人。冯治安升任营长,张自忠为副营长兼学兵队队长。8月,冯玉祥任陕西省督军,组建卫队团,张自忠任该团第三营营长。

1922年春,北洋军阀直奉两系燃起战火,冯玉祥的第十一师奉命进驻河南。战后冯被任命为河南省督军。冯抓住良机,广募新兵,兵力达5万人。为了培养初级军官,冯玉祥成立了学兵团。冯亲自兼团长,张自忠任第一营营长。此时,张练兵已小有名气,但因资望不够,冯责成他以第一营营长名义管理全团训练。冯玉祥军务繁忙,无暇顾及学兵团,全团工作实际上由张自忠负责。学兵团是冯玉祥治军的样板,凡有检阅,必以该团为前列。冯玉祥将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张自忠,可见对他的信任和器重。

1922年10月,冯玉祥调任陆军检阅使,驻军北京南苑和通州一带。1924年春,张自忠升任学兵团团长。他虽当了团长,仍勤奋努力,埋头苦干,有险重任务冲在前面。这年,为疏通永定河旧河床,冯玉祥命令学兵团,赶在春汛到来之前完成任务。张自忠带领全团官兵决心提前完成。他除了督导指挥外,还亲自挖土、抬筐,手磨破了,肩压肿了,照样干。眼看要竣工了,洪水却提前到来。张自忠一面派人挖导水沟,一面叫人堵住水头。可是水势凶猛,撂下去的石块、土块在水中翻几个跟头,就冲走了。张自忠急中生智,几步冲进水里,官兵们也跟着跳了下去。张见水里的人站成了一排,便扑通一声躺到了人墙背后,随即有很多人躺到水里。这样,一道人体堤坝筑成了。与此同时,那边的导水沟挖好了,从而避免了一场水患。

1924年秋,张自忠的学兵团移驻丰台。丰台被英国军队盘踞多年。张部

到达丰台车站时，英军不准进入。张自忠派一个连强行进驻。英方派人交涉，张严正指出：“丰台车站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军队在自己的领土上执行任务，外国人无权干涉！”英军派兵包围了车站。张自忠下达命令：“他不犯我，我不犯他，他若犯我，坚决消灭他！”英军射击寻衅，气焰嚣张。我即还击，并突袭敌后，英军不支，撤退。驻在铁道上的英军不准我执行任务的士兵携带武器，冲突再起。英方要求中国撤兵，张说：“这是中国的领土，不是英国的地盘，撤退的应该是你们！”英军碰到了强硬对手，理屈词穷，只得撤出丰台。

张自忠第一次与洋人打交道，就显示了铮铮铁骨，不畏强暴，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后来有人评论说：“张将军以他平时的人格修养，独能以不屈不挠的态度，应付他们，较之当日的统兵大员，已觉出人头地一等。”

1924年9月，冯玉祥借直奉战争之机，发动“北京政变”，直系军阀失败。冯将所部及参加倒直的部队组成国民军，自任总司令。翌年1月，冯玉祥被任命为西北边防督办，率军到贫瘠的西北地区，督办公署设于张家口。不久，国民军被改称为“西北军”。该年9月，张自忠升任第十混成旅旅长。1927年4月，冯玉祥率部参加北伐，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率部移驻河南省郑州。同年底，张自忠升任第二十八师（后改编为第二十五师）师长，兼郑州警备司令，负责维持郑州治安，保卫总部安全。第二十八师是第二集团军编制最完整、装备最精良的一个师，被冯玉祥定为“荣誉师”，且担任卫队师的任务。从这个安排，再次说明冯玉祥对张自忠的信任和器重。

为了培养初、中级干部，冯玉祥在学兵团的基础上成立了一所军官学校。由于张自忠多年任学兵团团长，有丰富的军事教育经验，故兼任军官学校校长。1928年7月，第二十八师和军官学校都移驻开封。

四、善于练兵 治军严明

军官学校的宗旨是，培养一批具有多种优秀品质，能够担任各级基层工作的指挥员。张自忠深知，要达到这个目标，学员们必须具有坚强的意志，健壮的体魄，娴熟的技术和必胜的信心，而这些都有赖于平时的刻苦训练。为此，张提出：通过训练，每个学员都要做到冬不衣裘、夏不挥扇，能忍三日之饥渴。训练的具体做法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夜练黑漆头。”

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三九天，早上5点半开始朝会和晨操。为了给学员示范，张自忠经常把第二十八师的官兵拉来与学员一起操练。在严寒的清晨，士兵们光着膀子练刺枪、劈刀和拳术，杀声震天，威风凛凛，学员们看得目瞪口呆，赞不绝口。强行军是严冬季节经常训练的项目。张自忠和学员们一样，全副武装，不戴手套，不穿鞋袜，将棉裤卷到膝盖以上，往返行军30里，一路上留下了斑斑血迹。行军结束张自忠讲评时，他的脚还在滴血。

夏日三伏天是练兵旺季，除上下午8个小时的课程外，还有早晚两次出操各2小时。要求内穿白裤褂，外穿军衣，扎皮带，衣帽整齐。在酷暑中强行军比冬天更艰苦。强行军都安排在中午11时至下午2时最热的时候，每人负重三四十斤，不准穿鞋，头顶烈日，脚踏热土，路上的蒺藜扎得双脚流血。张自忠不骑马，不殿后，而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行军结束时，很多学员，包括张自忠，脚板已血肉模糊了。

张自忠特别注重夜间练兵。常在没有月光的黑夜，吹响紧急集合号，不

准点灯，在 15 分钟内，起床着装，束皮带，背水壶和干粮袋，枪上刺刀，到操场集合。夜间训练的项目有：水平射击、对抗演习、挖掘散兵壕、夜行军、利用星辰识别方向等。

张自忠十分注意雨中练兵。常在倾盆大雨中，进行攻防战斗演习，锻炼雨中指挥、射击、行进和识别方位的能力。

张自忠还狠抓刺枪、劈刀及拳术训练，这些是体力与技能的结合。在武器装备不良的情况下，体力与技能对于发扬近战之长，弥补武器的劣势，最终战胜敌人具有重要意义。西北军各部队都特别重视这方面的训练，并取得显著成效，在后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以上都属于“术科”训练。此外，还有对学员进行精神、思想和军事理论教育的“学科”训练。

冯玉祥治军特别重视精神、思想教育，曾亲自主持制定《爱民十事》、《爱国精神三十条》等爱国爱民条规。冯还曾下令全军官兵左臂缀以臂章，上书“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这 10 个字概括了冯玉祥爱国爱民的政治理想。

张自忠发扬冯玉祥的治军传统，用精神教育培养、激发官兵为国家为人民而战的勇气，提高官兵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冯玉祥、张自忠的精神、思想教育也有很大局限性。

因为当时士兵和学员文化程度不高，进行爱国爱民教育都采用十分通俗的形式，官兵“对话”就是其中的一种。“朝会”时，张自忠登上指挥台，高声问士兵和学员：“你们的父母是什么人？”答：“老百姓！”问：“你们的兄弟姐妹是什么人？”答：“老百姓！”问：“你们参军前、入学前是什么人？”答：“老百姓！”问：“那我们应不应该保护老百姓？”答：“应该！”

为了对官兵进行思想教育，爱国爱民，铭记国耻，张自忠还请人创作了《爱民歌》、《国耻歌》教士兵、学员传唱。还绘制了“国耻地图”，将被列强瓜分的中国领土，都在图上用红色标明，并注明侵略者，侵略时间和侵略方式。要求每个人熟读熟记，随身携带以备查阅。

张自忠还让士兵、学员在自己的床头贴一个类似座右铭、志愿书的条幅，写上几条，如爱国、勤学、杀敌、立功等，每天以此对照自己的言行，以求上进。

军官学校的纪律非常严格，烟、酒、嫖、赌绝对禁止，学员一律剃光头，违者必罚。有一次正在上课，张自忠突然临时检查，在一个学员的口袋里搜出一个烟屁股，张令他吞下去。那个学员只得硬着头皮，龇牙嘴，把烟头嚼碎，死命咽了下去。

军官学校和第二十八师规定：学员和士兵有事请假外出，必须准时归队销假，逾期不归又无正当理由者，罚。外出服装不整，走路吃东西，两人以上不排队行走，路遇友军不主动敬礼，都要罚“禁足”，甚至关“禁闭”。在外酗酒、违章犯法，轻者罚跪，重者棍责，决不宽贷。

张自忠对第二十八师和军官学校军官的约束也很严厉。一位团长的父亲因土地问题与人发生诉讼，几年未得解决。这个团长要请假回乡解决家中土地纠纷。张自忠说：“军官不能打官司，可以请求解职，以平民的身分诉讼，官司了结后，回队另行任用。”有一次阅兵，某旅号长未按规定穿黑色袜子，张自忠气愤地说：“在这样的场合，你怎敢违犯军纪？”这个号长被军法处

拘押多日，该旅旅长被罚立正两小时。

张自忠最痛恨军官贪污、“喝兵血”。他规定，各部出现战死、病亡和逃兵，必须于24小时内报告师部，不报或冒名顶替者，主官一律撤职。张自忠发现某营营长帐目不清，侵吞士兵存款，极为震怒，立即集合全师干部训话，厉声斥责那个营长：“你这种恶劣的行为，是军中的败类，团体的蠹贼，害群之马！”命令打200军棍，撤职镣押。

张自忠投入冯玉祥的麾下后，很长时期从事军事教育，当过学兵连长、学兵团长、军官学校校长，为此，他付出了极大精力，也结出了丰硕果实，培养造就了数以千计的训练有素、能打硬仗的中、初级军官和一批高级将领。他任学兵连连长时的126名学兵中，就出现5个军长、5个师长、8个旅长，团长、营长就更多了。这些人遍布西北军各部，成为全军的中坚力量，绝大多数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西北军解体 拥戴宋哲元

蒋介石为了削弱冯玉祥的西北军和其他派系的军事力量，于1929年1月召开编遣会议，确定全国设立8个编遣区，蒋控制4个；规定全国军队的一切权力收归中央；各集团军无权擅自行动和任免军官；各系军队原地待命听候改编。各派系对此种做法极为不满，冯玉祥决心联合晋、桂两系讨伐蒋介石。

在冯玉祥忙于备战倒蒋之时，晋系阎锡山为增加与蒋介石讨价还价的砝码，诱使冯玉祥进入山西，将其软禁。冯失去自由后，委任第二十八军军长宋哲元代行总司令职权。

宋哲元字明轩，1885年生，山东省乐陵县人，早年投奔冯玉祥，是西北军几名最主要的将领之一，也是冯的“五虎上将”之一。冯对宋十分赏识，称赞他“勇猛沉着”，“忠实勤勉”，“遇事不苟”，“练兵有方”，视之若心腹股肱，常委以重任。1922年，宋哲元已是旅长，张自忠则是副营长。因此，宋是张的老长官，对张有很大影响。后来，宋是张的直接领导，对张的影响更大。

宋哲元任代总司令后，任命张自忠为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二十二师师长。冯治安是这个军的军长，对此项任命，张自忠十分感激宋、冯。因为在此之前，由于形势所迫，张曾短期离开冯系，寄晋系篱下。不久，即主动回到冯部，但冯玉祥没让他回原部队带兵。现在宋、冯授他以兵权，这使他感激不尽。这件事是张自忠后来拥戴宋哲元、力荐冯治安的重要原因。

1930年4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接着对蒋介石集团开战，各派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爆发了。

此时，张自忠任第六师师长，奉命率部参战，与蒋军的精锐部队教导第二师相遇。张自忠指挥全师，发动猛烈进攻，与蒋军展开近战，使蒋军炮火无法发挥作用。经过反复拼杀，将蒋军击溃。经此一役，蒋军的教导第二师元气大伤。这个师在蒋介石的部队中，编制整齐，拥有当时中国军队最精良的装备，且是德国顾问团精心训练出来的，是蒋介石两个“近卫师”之一。张自忠师将其击溃，足见张部战斗力之强。

战事初期，反蒋联军进展顺利，蒋军处境被动。但由于反蒋联军不统一，矛盾多，被蒋介石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更由于东北军首领张学良表态支持

蒋介石，使蒋的势力大增，战局急转直下，反蒋联军以失败告终。

这次失败最惨的是冯玉祥的西北军。西北军鼎盛时期，总兵力达40余万人，是全国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这次参加军阀混战，除少量伤亡外，绝大部分被蒋介石收买、瓦解，以致造成灭顶之灾，40万大军所剩无几。冯的“五虎上将”，李鸣钟、张之江早在这次大战前就脱离了冯系，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刘郁芬于这次大战后叛冯投蒋，赴南京就任上将总参议；鹿钟麟与冯共进退，与冯同时宣布下野；只有宋哲元率残部退往山西，算是留在军中。

张自忠此时尚有两个旅、一个团，兵力有数千人，是西北军较为完整、兵力最多的一支部队。张也率部进入山西。此后，西北军的残部陆续进入山西，总数约六七万人。由于各部队互不相属，群龙无首，驻地分散，加之粮饷无着，装备残缺，编制不整，所以处境极为艰难。如何收拾残局，整编部队，就成为西北军能否生存下去的当务之急。

进入山西的西北军将领中，以宋哲元的资望最高。此时，冯玉祥已无法掌握部队，宋哲元决心出来收拾残局。

恰在此时，蒋介石决定，将在中原大战反蒋失败的晋军、西北军改编为边防军，由张学良负责改编，并归其节制。张学良确定将西北军残部缩编为一个军，拟由张自忠担任军长。张自忠感到自己的资望不够，就积极拥戴宋哲元出任军长。张一向敬重宋的为人和战功，认为由宋出任军长有利于收拾残局。同时，中原大战前，张在逆境中，曾得到宋的优待，任命他为师长，授以兵权，因而对宋一直怀有感激之情。

此时，张自忠也想到另一个人——冯治安。在中原大战中，冯治安败得最惨，所部被打散，成了光杆司令，只身到了北平。他曾与张自忠长期合作，换帖结拜为盟兄弟。且在张失意时，伸以援助之手，使张重掌兵权。张自忠不忘往事，知恩图报，积极推荐冯治安任整编后的师长。

1931年1月16日，蒋介石、张学良正式宣布西北军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任军长，下辖三个师：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暂编第二师师长刘汝明。全军共2万余人。从此，西北军的名号消失了，冯玉祥也失去了在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资本。

中原大战葬送了西北军，但第二十九军的诞生，使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等人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为西北军创造了更辉煌的业绩。

六、喜峰口、罗文峪大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一方面炮制伪满洲国，一方面大造“热河为满洲国土”、“长城为满洲国界”的舆论，加紧对华北的侵略。1933年元旦，日本在山海关制造事端，炮击临榆县城。驻临榆的东北军忍无可忍，奋起还击，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南京国民政府恐事态扩大，不予支援。3日，山海关失守。日军继续向锦州、通辽、绥中集结，准备三路进攻热河省。

山海关陷落后，张学良感到再不积极抵抗，恐热河、河北两省难保。于是，进行军事部署，受其节制的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调至北平东边的通州、蓟县、三河、宝坻等县待命。由于第二十九军既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不属于张学良的东北军，所以装备落后，武器不足。全军只有野炮、山炮10余门，重机枪不过百挺。每连只有轻机枪两挺。所用步枪陈旧，型号不一，

弹药补给困难，许多步枪没有刺刀。按照西北军的传统，每名士兵配备大刀一把。这古老的武器后来在歼灭日寇中大显神威。

2月下旬，日军继续向热河进犯。中国军队毫无战斗力，不作抵抗，日军仅以128人，没费一枪一弹，于3月4日占领了热河省省会承德。紧接着，日军进犯长城，华北长城沿线抗战爆发了。张学良令第二十九军赶赴长城的喜峰口，策应友军作战。

喜峰口位于河北省迁西县北部，燕山山脉中段，是长城的重要关隘，也是塞北通向京都的交通要冲。这里层峦叠嶂，山险谷深，绝壁危崖。沿山脊修筑的长城，依势蜿蜒，成为华北的屏障。

宋哲元任命张自忠为第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冯治安为副总指挥。第二十九军赶到喜峰口时，中国守军已撤至喜峰口内，日军占领了喜峰口东北的制高点，居高临下，以火力控制喜峰口，对我军极为不利。

3月9日午后，第二十九军赵登禹旅赶到喜峰口，与敌遭遇，激战至深夜。10日拂晓，敌集中炮火向我阵地猛烈攻击。赵令官兵离开战壕，埋伏于各峰峦处。敌炮火稍减，再回战壕。待敌步兵距战壕数十米时，鸣号出击，我官兵挥舞大刀，与敌肉搏。赵登禹亦冲入敌阵，左砍右杀，如入无人之境。赵身材魁梧，体格健壮，武功高强，是西北军有名的勇将。经过整日激战，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但我伤亡1000多人，赵登禹负伤。张自忠、冯治安及时改变战术，以我军惯于夜战、近战的优势，出其不意，夜袭敌营。

11日夜，我军两个团分两路奔袭敌营。夜深人静，两千健儿身背大刀，寒光闪闪，行动矫健。赵登禹强忍剧痛，率一个团出征。拂晓前，赵率部摸到敌骑兵宿营区。官兵们挥舞大刀，向酣睡的敌兵砍去。日军从梦中惊醒，还未清醒，已身首异处。杀得敌人魂飞魄散，抱头鼠窜。我军越杀越勇，一个敌兵也不放过。时间不长，干净利索地结束了战斗。

另一个团12日凌晨进入敌炮兵阵地，官兵奋力砍杀。由于敌援兵赶到，我伤亡600多人，一名团副、两名营长阵亡。他们将敌野炮、汽车、弹药车焚毁后撤回，歼敌数百人，缴获机枪20余挺。

日军遭到重创后，13日对我军发动大规模反扑，战斗异常激烈。14日拂晓，张自忠指挥两个旅，实施拂晓攻击，毙敌数百人。15日，张自忠亲临前线，视察阵地，给官兵们很大鼓舞。

喜峰口6天鏖战，日军重重受阻，“异常疲惫”，“士气馁败”，于是改变主攻方向，把进攻矛头转向罗文峪。

罗文峪处于喜峰口、古北口之间的凹入处，如这里被敌占领，喜峰口、古北口我军的侧后将受到攻击，使我军腹背受敌，难以立足。我罗文峪的守军是第二十九军刘汝明的暂编第二师。张自忠令两个团急援罗文峪，并亲率师直属部队和手枪营到第一线督战。

17日，敌以飞机、大炮作掩护，5000多敌兵向罗文峪等处猛烈攻击。我诱敌迫近，先是一阵手榴弹投向敌群，然后挥舞大刀冲出阵地，与敌肉搏。战斗竟日，阵地几次易手，战况异常惨烈。

18日凌晨，敌调集步兵、骑兵、炮兵混合部队3000余人，再次发动进攻。刘汝明师长亲率手枪队督战，顶住了敌人的进攻。在我军机枪、手榴弹和大刀的顽强抵御下，敌人被迫退去。午时，敌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分两路再次向我阵地进攻，激战至黄昏。深夜，我派出两个团，分两路奔袭敌侧背。两路勇士奋勇出击，搏战通宵。刘汝明师长见敌阵动摇，令前线反攻，实行

前后夹攻，一举将三岔口、快活林、水泉峪、马道沟一带的敌人击溃，残敌狼狈逃窜。这是继喜峰口大捷之后的罗文峪大捷。

此后，第二十九军除一部分兵力在长城口外据守前沿阵地，监视敌人外，主力则在喜峰口、罗文峪、马兰峪长城沿线构筑工事，与敌处于对峙状态。敌人从哪一点进攻，都要付出很大代价。

4月11日，战局发生重大变化，日军从我长城防线右翼的冷口突破，攻入长城以内。第二十九军陷于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境地。由于日军已进入长城以内，我军再守喜峰口、罗文峪，既不可能，也无必要。4月13日，第二十九军奉命撤出这两个阵地。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加紧与日本谋和，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的占领，并使察哈尔省、河北省的东部成为日寇自由出入地区，这就为侵略者打开了华北的大门。

喜峰口和罗文峪大捷是长城抗战中仅有的胜仗，消息传来，举国振奋。这是第二十九军全体官兵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结果，全军付出了伤亡5000多人的惨重代价。这是第二十九军对国家、对民族的重大贡献。作为此战役前线总指挥的张自忠，受到国人的称颂和舆论的赞扬。

七、任察哈尔省主席

长城抗战后，第二十九军驻防察哈尔省，宋哲元任察省主席。张自忠的第三十八师驻宣化。

察哈尔省（现分属内蒙古和河北省）当时属华北，因境内有蒙古族察哈尔部而得名。省会张家口市，又称张垣，扼长城要塞，为塞北重镇。察哈尔省地处华北西北部，与热河省毗邻，是西取晋绥、南下平津的战略要地，成为日本侵略者攻击的下一个目标。

1935年1月18日，日军在察东无理挑衅，挑起事端，制造扩大侵略的借口。张自忠命所部坚守我阵地，并亲临前线督战。由于国民政府的软弱退让，使日军达到了“用侧击旁敲办法，逐步前进”的目的。是年夏，日军再次接连制造事端，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屈辱的《何梅协定》，致使国民党的中央军、张学良的东北军及国民党的党务、特务机关从河北省、察哈尔省和北平、天津两市撤出。这样，日本就攫取了冀、察两省大部分领土的主权。

紧接着，日本又搞了“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妄图在华北建立亲日的傀儡政权。恰在此时，宋哲元利用汉奸、土匪在天津、北平发动武装暴乱，命第二十九军一部进入北平。在中央军、东北军被日军驱逐出华北的情况下，蒋介石只得承认这个既成事实，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这样，第二十九军不仅可驻军于冀察两省，而且控制了平津两市，宋哲元则成为华北第一号实力人物。

宋哲元为了在华北站住脚，谋求第二十九军的生存和发展，想利用日、蒋之间的矛盾；而南京政府感到在华北形势日趋紧张、复杂的时候，需要宋哲元从中缓冲，出面与日周旋；日本为了肢解华北，则把第二十九军作为拉拢的对象。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1935年12月8日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任委员长，下辖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

北平学生为了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成立变相自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发动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积极响应，掀起了轰轰

烈烈的爱国救亡运动。

宋哲元主持冀察政务委员会，矛盾重重，处境复杂，左右为难。他既想保持第二十九军的抗日荣誉，不甘心当日军的傀儡，又畏惧日本强大，不敢公开与之对抗；他既表示拥护中央，不脱离与南京的隶属关系，又想和华北实行有限自治，以使第二十九军的实力得到保存和发展。从后来的事实看，宋哲元的爱国立场和民族气节没有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苦衷逐渐为国人所理解。

政务委员会成立不久，张自忠被任命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兼察省保安司令，第三十八师移驻张家口市。

张自忠主察前夕，日本利用伪蒙保安队占领了察北六县，气焰嚣张。张上任后，极为愤怒，欲发兵击败敌寇，收复失地。宋哲元考虑到，政务委员会成立不久，第二十九军在华北立足未稳，不愿与日军发生冲突。张为此情绪低沉，非常苦恼。他对友人说：“日本指使伪蒙军，强占沽源等县，这明明是日军进行侵略，无理欺压。不打吧，我有守土之责；打吧，宋委员长又不准。军人又必须服从命令，硬打又属犯上。只有自杀，才是出路。”

日本占领察北6县后，又要攻占张家口北边的大镜门一带。大镜门乃长城要塞，张家口的大门，如被日军占领，张家口将受到严重威胁。张自忠一面进行兵力部署，一面派人与日本交涉。张对派去的人说：日伪军只能驻张北县以北，我军驻张北县与张家口之间的缓冲地带。如他们继续往南开，发生误会，完全由他们负责。由于我方态度强硬，兵力上又作了部署，日军未敢轻举妄动。

张自忠主察期间，对日军的无理挑衅，蓄意制造事端，也想进行反击，维护民族尊严，但这不是他所能决定的。在当时形势下，他只能谨慎地同日本人周旋，对敌伪方面的人员曲意应酬，甚至作出“友好”、“亲善”的姿态。张自忠知道，同日伪的消极应付，只能是权宜之计，将来全国抗战爆发，仍需要武力解决。为此，他除了积极做好正面宣传，鼓舞人民信心，努力改进军事交通，为将来的抗日战争作准备外，重点是抓紧部队建设，为抗战积蓄力量。张自忠以很大的精力抓部队的整备、训练。第三十八师成立了教导大队，培训中、初级军官。到1936年初，第三十八师下辖4个旅，总兵力达1.6万人，武器装备也有很大改善。

张自忠任察哈尔省主席不到8个月，1936年6月调任天津市长。

八、任天津市长

天津是中国北方重镇，当时北方最大的商业中心，是北宁、津浦铁路的交点，是帝国主义势力在华的汇聚地。当时有39个国家在津设有领事馆，法、英、日、意等国在天津有租界和驻军。日本则把天津视为“征服中国的咽喉”，千方百计要控制它，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就设在这里。

张自忠上任后，在内政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如：整顿吏治，改革用人制度，组织精干的政府；精简财政支出，减轻纳税人负担，发展工商业；清理官产荒地，严控水价，抑制奸商牟取暴利；重视中小学教育，帮助学校购置设备，使教学手段现代化；发展社会文化，开展广播教学，宣传科学、医学、公共卫生常识；兴办福利事业，用以工代赈的办法，解决贫民的生活困难。

张自忠特别痛恨贪官污吏，决心严肃政纪。群众举发公安局侦缉队第二队长李某滥捕商民，擅自罚款后释放，仅两个多月，就获赃款1万余元。张自忠令立即逮捕。经审讯，李某还与贩毒有关。结果判处有期徒刑8年。对其他违法犯纪者，张自忠均严加惩处。如，市警察局第六分局局长、水上警察局警长、一等警士等因渎职或收受贿赂，均被撤职，有的还押送保安司令部惩办。

在严明法纪、不徇私情方面，张自忠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他任天津市长后，许多亲属、同乡、故旧求他办事、安排工作。对要求办事者，他一律按规定处理；对求职者，够标准者用，否则婉言回绝。曾有一承包商想以65万元承包天津市的税务，签订合同时，只写30万，余款归张个人，张自忠不为金钱所动，严词拒绝。

针对日本在天津驻有重兵的情况，张自忠秘密向一旅长交待：我们的官兵大多来自农村，对市内道路不熟悉，一旦发生战事，很不好办。你叫班长以上的干部换上便衣，每天轮流进市内熟悉地形，要特别注意日租界里的大街小巷。你旅的官兵，除陆军军服外，每人再预备一套保安队、警察的服装，并控制若干辆卡车。一旦与日寇发生冲突，就穿上保安队服装，特别区穿上警察服装，用卡车迅速输送进市内来应付事变。

张自忠深知，日本侵华野心很大，迟早要发动大规模战争，华北地区必有一场恶战。为此，他在忙于政务的同时，还以很大精力整训部队。他千方百计改善部队的武器装备，以提高战斗力，还抓紧军官的培训，除送少数将领到南京受训外，还通过自办教导大队和第二十九军军训团培训大量中初级军官。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初期，宋哲元在华北立足未稳，想借重日本的势力，对日以“睦邻亲善”为主。张自忠认真执行了这个政策。

张自忠主持津政伊始，先后宴请了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和参谋长，每次都有亲日派人物王揖唐、曹汝霖、陆宗舆、齐燮元等作陪。日本军政要员也纷纷来天津访问。仅1936年8.9月，就有关东军参谋长、日本驻华大使和驻苏联大使来访。

为取得日本的支持、合作，宋哲元以“舍小利而保大权”的方针，表示在经济上可作些让步，对日本提出的日中“经济提携”也表示赞同。据此，张自忠积极与日方谈判，签订了一些协议。如成立“中日合办天津电业股份有限公司”、缔结《中日通航协定》、成立“惠通公司”等。张还参加了与日方筹建津石铁路、开采龙烟铁矿、长芦盐输往日本等项目的谈判。

由于冀察当局与日本的经济商谈有些是秘密进行的，社会上出现了种种传言。南京国民政府也认为，矿产资源的开发权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不能擅权，指示宋哲元在中日“经济提携”方面要慎重行事。宋哲元、张自忠得到中央政府的明令，也考虑到舆论界的强烈态度，并通过事实的教育，逐渐醒悟到日本宣扬的中日“经济提携”的实质和后果，因而以各种方式中止或改变了已经开始筹办的项目。对由此带来的日方的纠缠和压力，他们采取消极应付、敷衍塞责的办法，使一些项目拖延不决，不了了之。

还有一件事使国人对张自忠疑惑不解，引起种种猜测，甚至使他的政治面貌模糊不清了。这就是1937年4月，张自忠率“冀察平津国外旅行团”赴日本访问。此时，中日关系已很紧张，1937年元旦后，宋哲元连续发表声明，表示拥护南京中央政府，执行中央的命令。第二十九军广大官兵更是摩拳擦

掌，抗日热情高涨。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的头目说：近来抗日空气弥漫平津一带，他们已是“大祸临头”，“如何使宋哲元逃不出我们的掌握，乃是北平特务机关应尽全力的任务”。他们为了控制宋哲元，乃向他发出访日“邀请”。对日的“邀请”，宋哲元不好拒绝，同时他也想力图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以延长华北的稳定局面。但又考虑到，若自己以冀察当局最高领导人身份访日，一旦日方就“经济提携”等提出无理要求，他没有回旋余地，所以决定由张自忠率团访日，张在日遇到难以回答的问题，可以须请示宋为辞不予答复。从张自忠与一位朋友的对话，也能说明张这次访日的目的和苦衷。问：“为什么要到日本呢？你知道这于你的名誉将会发生不良影响的。”张答：“我知道，但是在和平未绝望以前，我希望能够打开一个局面，维持一个较长的局面，而使国家有更充实的准备，其它毁誉我是不计较的。”

张自忠可谓一心为国，忍辱负重，从他访日期间发生的两件事，就可看出他的爱国立场和民族大节是十分鲜明、坚定的。

旅行团到达名古屋后，张自忠接到中国驻日大使馆的通知，说中国大使回国述职，国际博览会明天开幕，请张代表中国大使主持中国馆的揭幕仪式。张派两个人先去博览会了解情况，发现在中国馆的对面是伪满洲国馆，并挂有伪满的“国旗”。张自忠十分气愤，立即派人向日方交涉，明确指出：东北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不承认什么“满洲国”。博览会把所谓的“满洲国”馆放在中国馆的对面，是对中国的极大侮辱，必须立即撤除，否则，旅行团将立即回国。由于我方态度坚决，日方被迫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次日，张自忠才主持了中国馆的揭幕仪式。

还有一次，日方安排张自忠参观明治天皇神社，随即邀张到神社对面的几座平房参观。听去过那里的人讲，元朝忽必烈东征日本时，曾有船队在对马海峡遭遇暴风沉没，日本将打捞上来的一些东西，作为战利品陈列在那几座平房里，夸耀日本自古就是一个强国。张自忠知道这些情况后，拒绝去参观。

5月底，张自忠回到国内。这次1个月的赴日旅行观光，使张自忠很懊丧，“中日亲善”究竟是什么？仅仅过了1个月，日本就以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

九、临危受命 忍辱负重

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北平西南郊的卢沟桥，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了。

冀察当局遵照南京政府“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易牺牲”的原则，事变前一直奉行“但有一线希望，总以弭患为是”的方针。事变发生时，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不在北平，他电示张自忠等：“必须镇定处之，相机应付，以挽危局。”他还说：“日本不会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这样的事件以前不是已经发生多次了吗？只要我们肯作一些让步，局部解决还是可能的。”

此时，日方也诡称：这是“地方事件”，可以进行和平谈判。

张自忠秉承宋哲元的意见，向日方谈判。宋回到北平后，也参加了谈判。宋认为，谈得很好，和平解决不成问题。他下令北平拆除路障和防御工事，将关闭了几天的城门都打开。20日，宋哲元发表谈话：“此次卢沟桥事件之发生，决非中日两大民族之所愿，盖可断言。……哲元对于此事之处理，求

合法合理之解决，请大家勿信谣言，勿受挑拨，国家大事，只有静听国家解决。”

在前线的第二十九军一些将领，曾想乘日本大部队尚未开到之时，夜袭丰台敌军。张自忠却说：“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现在要紧的不是打，而是和平解决。”他向部队发布“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致使我军丧失了一次主动歼敌的好机会。

殊不知，日本“和平谈判”完全是缓兵之计。当他大军运到，便撕毁协议，扩大战火。到25日，日本在平、津一带的兵力，已从1万多人增加到5万人以上，而且还在不断增兵。

直到这时，宋哲元才认识到“大战势所难免”，“决心固守北平，誓与城共存亡”。张自忠也命令驻守北平和天津附近的第三十八师官兵，坚决打击来犯之敌。蒋介石下令给第二十九军补充300万发子弹，各兵站仓库向平津推移。这些都表明中央政府和冀察当局对抗战的态度，有了很大变化。但为时已晚，大局无法扭转。

日本作好全局进攻准备后，27日向平津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北平已成一座孤岛。28日，日军向北平南郊南苑的我军夹击，同时数十架飞机低空轮番轰炸。我军前赴后继，英勇抗击，突围时，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为国捐躯，南苑失守。

该日下午，宋哲元决定，第二十九军于当日夜从北平撤往保定，但仍幻想与日本谈判，以保住第二十九军的地盘。他说：为了全局，保存实力，全军必须立即撤退。但要留下得力人员与日本人周旋，以缓和局势。宋想把这项艰巨任务交给张自忠。他对张说：“我今晚就走，明天你就和日本人接触，好维持局面。谈得好的话，第二十九军兴许还能返回平津。谈不成也不要紧，只要能拖延几天时间就行。”

对这项有很大政治风险又十分棘手的任务，张自忠颇为踌躇。因为卢沟桥事变后，社会上就有“三十七师（冯治安师）打，三十八师（张自忠师）看的议论。部队对张一再与日本谈判，不让我军主动出击歼敌的做法有不满情绪。如张再留下来与日本人周旋，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但在宋哲元一再要求下，张自忠表示：“既然委员长这样决定，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只要于我军及国家民族有利，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过，委曲求全，关系个人名誉，恐不能为国人所谅解，事后应请委员长代为剖白。”宋答应了张的请求，即写下手谕，委任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北平市市长等职，全权处理北平事务。当晚，宋哲元率第二十九军撤离北平。

事情决定后，张自忠身边只留下副官、勤务、炊事员，其它人员都到作战部队。他还给第三十八师的主要将领写信，要他们服从指挥，团结抗战。

为了与日本人接触、交涉，张自忠将一些亲日派甚至汉奸拉进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样一来，人们对他的误解更加深了。许多报刊对张痛加辱骂，将他与中国历史上的汉奸张邦昌、吴三桂相比。有的报纸的大标题是：《张自忠会见松井后，北平城门大开》。南京政府派驻北平的官员也向南京报告：张自忠“有参加日军行动之说”；“自忠、燮元、允荣、毓桂、张璧、仲孚、觉生（后6人均是亲日派或汉奸）将主要政，汉奸全获胜利”。此时，张自忠已成众矢之的，蒙受了不白之冤。后来，宋哲元虽然作了很多解释，为张剖白，主动承担了责任，但舆论界对他的误解和批评，却一直没有完全消除。

这件事给张自忠造成精神上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后来，他多次谈及此事。

张自忠的苦心安排，未起到任何作用。日本人不承认张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更不与他谈判。日本人网罗了一批汉奸、亲日派拼凑了一个“北平安维持会”，作为他的傀儡。

张自忠此时才感到处境危险，要想办法立即离开北平。8月1日晚10时，张率留在北平的部队3000多人突围，自己与精干的手枪队在后边掩护。突围时，遭敌人阻击，我军伤亡很大，有1000多人未能冲出。张见前面部队受阻，自己未再强行跟进。此后，张又有几次冒险出城，均未成功。

此时北平已完全沦陷，张自忠身陷敌区，无异在虎口之中，要千方百计脱离险境。张先秘密住进东交民巷使馆区的一家德国医院。但医院来往人多，很不安全。过了几日，他化装成学者，隐藏在一位美国朋友家里。这时，侵略者的战火日益蔓延，张自忠急切地要到抗日前线去。经过随身副官的奔走，联系，在一位美国商人的帮助下，张自忠化装成工人，于9月3日凌晨4时许，在天色朦胧中，潜离北平，到达天津英租界内一位友人家。

第二天深夜，张自忠回到法租界内自己家中。他在夫人房中只呆了很短时间，然后向家人简单嘱咐勤俭生活、教育儿女的话，就怀着沉重的心情与家人告别了。此时，他预感到这是与家人的永别。因为他已下定决心，重返沙场，誓死报国。也惟有如此，才能洗雪自己的不白之冤。

10日拂晓，张自忠在英国友人帮助下，乘英国驳轮到塘沽，换乘英商船南下，他终于跳出了日本人的魔掌。张自忠到济南后，第三十八师请他回部队，率所部抗战。张坚持要去南京，他说：“纵使国人不谅，中枢也可能将我置之典刑，我还是要去的！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还能为自己个人打算吗？若这样，我早就会不让国人怀疑我了。”这位正直的军人再一次显示了自己的坦荡胸怀。

张自忠到南京后，蒋介石予以慰勉，鉴于舆论的激愤，给予撤职查办处分。1个月后，任命张为军政部中将部附。后在冯玉祥、李宗仁、程潜等高级将领一再要求下，蒋介石终于批准张自忠暂代第五十九军军长，“戴罪图功”。（8月中旬，第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任总司令，张自忠的第三十八师改编为第五十九军。）

张自忠对这项任命，惊喜万分，感激涕零。他郑重而深情地说：“蒙各位成全，恩同再造。我张某有生之日，当以热血生命报答国家，报答长官，报答知遇！”

此言出于至诚。后来，张自忠以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十、驰骋沙场 屡建战功

1937年12月7日，张自忠到第五十九军就任军长。该军下辖2个师，共5个旅，总兵力约3万人，驻河南省焦作一带。全军热烈欢迎老长官归来。张在欢迎会上讲了奉命滞留北平的情况，并说：“现在敌人气焰嚣张，正是我们戴罪图功的时候。无论什么部队都可以打败仗，唯有我们不能打败仗，我们只有下定死战的决心，与敌人一拼到底，才能求得国人的谅解，也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张自忠一回到部队，就对全军进行整训，在他精心组织和严厉督饬下，加紧实战训练，全军技术、战术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1938年1月初第五十九军由第一战区（宋哲元为副司令长官）改属李宗仁的第五战区。

1938年2月4日第五十九军奉命南下，增援淮河前线。张自忠抓住战机，指挥部队在淮北痛歼敌军，敌阵脚大乱，伤亡2500多人，被迫放弃淮河北岸阵地，退守南岸。此为淝水之战，张自忠首战告捷。

日军由于淮河一线受阻，遂改以北路军队，从青岛出发，直攻临沂，并沿津浦铁路南下，攻击台儿庄和徐州。攻击临沂的板垣征四郎的日本陆军第五师，是日军战斗力最强的4个师之一，号称“铁军”。该师下辖4个步兵团，骑兵团、工兵团、野炮兵团、辎重兵团各一个，总兵力2.5万人，拥有一流装备和7600匹战马。

3月10日，张自忠部奉命增援临沂。14日凌晨，第五十九军向敌发起猛烈进攻，经过3天浴血奋战，给敌以沉重打击，自身伤亡3500多人。第五战区准备将第五十九军撤出战斗休整，张自忠要求再战。16日夜，第五十九军在友军配合下，再次向敌猛攻。经整日激战，英勇拼杀，至17日下午，击溃敌3个团，歼敌5000多人，击毙敌一名上佐（校）团长、一名中佐营长和数十名军官。

临沂大捷，振奋人心，举国同贺，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蒋介石致电李宗仁、张自忠：“临沂捷报频传，殊堪嘉慰。仍希督励所部，确切协同，包围敌人于战场附近而歼灭之。”临沂之战，由于敌板垣第五师被击溃，就粉碎了他与矶谷师团会师台儿庄的图谋，造成矶谷部孤军深入被我围歼的局面，因而临沂的胜利为台儿庄大捷拉开了序幕。

1938年5月中旬，日军调集大批兵力，形成对徐州地区的包围，妄图一举围歼第五战区的主力40余万人。数量如此之大的部队如被围困，后果不堪设想。李宗仁决定突围，将掩护大部队后撤的艰巨任务交给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和另外三个师。此时，张已升任第二十七军团军团长，兼第五十九军军长。

5月16日，大部队开始撤退。由于各路军队混杂，缺乏统一指挥，且后有敌兵追击，上有敌机轰炸，几十万大军行动迟缓。富有带兵经验的张自忠，下令第五十九军官兵翻戴军帽，与兄弟部队相区别，便于指挥和行动。我军在撤退中，不断遭到敌军拦截。张自忠命令所部全力投入战斗，掩护大部队突围。危急时，张亲率手枪营走在全军的最后。有一次，部队在一个小镇上休息，突然飞来3架敌机狂轰滥炸，张卧倒在路边的凹入处，一颗炸弹在附近爆炸，气浪溅击的泥土，掀掉了他的军帽。作为高级将领，在艰苦而危险的远程突围中走在部队的最后，这在国民党军队中是极罕见的。

经过近半个月的千里行军作战，历尽艰难险阻，6月1日，第五十九军胜利完成掩护大部队后撤的任务，抵达新的集结地。徐州突围的成功，使中国军队保存了数十万有生力量，这对以后坚持持久抗战具有重大意义。

日军占领徐州后，继续向华中进犯，妄图攻陷华中重镇武汉，围歼中国军队的主力。

1938年8月22日，日军由合肥西犯，图谋占领河南省南部的潢川、商城，以配合其对武汉的进攻。第五战区急令第五十九军奔赴潢川布防。9月7日，日军进至潢川的东部，遭我军阻击，敌我均有重大伤亡。日军连日进攻没有进展，竟大量施放毒瓦斯弹。在危急时刻，张自忠进入潢川城，决心与守城官兵共存亡。敌以密集炮火轰击潢川城，并向城内投掷毒气弹，我军伤

亡急剧增加。16日午后，敌集中大量野炮和重炮，对潢川城进行更猛烈的轰击，毒气弹的施放量也增加了几倍。17日中午，敌军冲入城内，张自忠下令，架起刺刀，与敌肉搏，战斗进入白热化状态。面对敌军不断涌入城内的险恶局面，张自忠一面组织敢死队发起攻击，将敌人的突破口封住；一面指挥官兵消灭冲入城内的敌军。至18日，第五十九军完成了阻击日军的任务，于19日凌晨撤出潢川。

潢川守城战，第五十九军孤军抗敌，阻击敌兵12天，为后方友军的集结争取了时间。此役共歼敌3000余人。敌电台广播说：“皇军在潢川方面曾遭到华军极强烈之抵抗，致蒙受巨大之损失。”在这次战斗中，我军伤亡4000余人，4名营长殉国，可见战斗之惨烈。

张自忠参加抗战以来，连战皆捷，战功显赫，名声大震。1938年10月，升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为副总司令，下辖3个军，总兵力5.5万人。一个月后，张自忠为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又称右集团军）总司令。

1939年4月初，中国军队发动“四月攻势”，张自忠率部向襄河东岸的日军出击，张亲临前线督战。是役歼敌2000多人，并收复了部分失地。蒋介石特致电张自忠：“此次京山之役，贵部坚强抗战，屡挫凶锋，使全线稳定，厥功甚伟，特奖赏洋2万元，代备死伤官兵抚慰等临时补充之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发命令，授予张自忠宝鼎勋章一枚。

十一、血洒襄东 壮烈殉国

1940年4月中旬，日军集中15万人窜犯随枣、宜昌地区。第五战区紧急调动约30万人拒敌，张自忠的右翼兵团担任襄河河防及大洪山一带的守备。

5月1日，敌分三路发起攻击，（随）枣、宜（昌）会战开始。经过一周激战，襄河东岸我军危急，张自忠决定东渡襄河亲临前线督战。众将领力劝张不要去前线，因为到了那里，能否与主力取得联系，能否有效控制战局，是否因孤军深入被敌吃掉，都难以预料。张认为，正是有这些问题，他才到前线去。张自忠决不会让官兵在前线拼命，自己却安在后方。他重返部队后，就已下定决心：誓死报国。他曾多次讲过这样的话，从他这次出发前，写给副总司令冯治安的信，也可看出：

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三十八师、一七九师取得联络，即率该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一七九师、三十八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

7日拂晓前，张自忠率总部人员渡过襄河，与河东各部队取得了联络，逐步控制了局势。官兵们得知总司令亲临前线指挥，士气大振。经数日激战，毙敌甚众，但我军也有很大伤亡。15日，张自忠及总部人员驻于宜城县一个小山庄——沟沿里。日军根据通讯侦察，判断出张及其总部的驻地，遂调五六千人和飞机、大炮向沟沿里合围，使张陷于重重包围之中。

16日拂晓，战斗打响了，敌军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敌我往返冲杀，阵地大而复得者4次。战到中午，我军弹药将尽，无法得到补充。张自忠指示部下：“敌人要狠狠地打！子弹打完了用刺刀拼，刺刀断了用拳头打，用牙

咬！”由于战况激烈，局势恶化，张自忠将军中的苏联顾问派人护送到安全地带，令总部的非战斗人员撤离战场。手枪营是张自忠的近卫部队，士兵多系冀、鲁、豫三省青年，身强力壮，作战勇猛，斗志顽强，屡在危急时刻建立战功。现在又遇到了险恶环境，尽管每人只有一支驳壳枪和一把大刀，没有重武器，但为了保卫总司令的安全，他们同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在鏖战中，营长腹部受伤，被抬下战场。代营长继续搏杀，不幸中弹牺牲。全营4名连长，1个阵亡，2人重伤，全营士兵伤亡过半。敌军从东、西、南三面以猛烈炮火轰击我军不到1平方公里的阵地，打得土石飞溅，硝烟弥漫。

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小，炮弹如雨点般飞来，步枪、机枪的叫声一阵紧似一阵。张自忠镇定如常，一手握着望远镜，一手翻看地图，从容指挥战斗。突然，一颗炮弹在指挥所附近爆炸，张右肩受伤。紧接着，又飞来一颗子弹，将张的左臂打穿，鲜血渗透了军装。卫兵们见状，惊呼：“总司令，您……”张不等他们说完，镇定地说：“没什么，不要大惊小怪。”卫兵们担心再出意外，都围到他的身边，以作掩护。张说：“你们跟这样紧干什么？怕我跑不是？”中午过后，敌军攻势更加猛烈，其前锋距我指挥所越来越近。十几名士兵将张自忠簇拥着转移到杏仁山。

下午1时许，日军调集大批山炮，在距杏仁山1500米的山头上，对我军疯狂攻击。为了减少伤亡，张自忠命令参谋和随从人员四处散开。由于张身穿黄色军装，目标十分明显，敌人的炮弹连连在他的前后左右炸落。张身边的副官阵亡了，他右腿被炸伤，裤腿、袜子都被血湿透。

下午两点左右，敌军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发起攻击。张自忠身负重伤，坚持指挥战斗。此刻，他只是希望在战死之前指挥仅有的兵力多杀死几个日本鬼子。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我军占据的山头失守了。敌兵从山顶冲下来，张自忠身边的士兵一面奋勇抵挡敌兵，一面高喊：“总司令快走！总司令快走！”这喊声更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更加紧了对他们的围攻。

3时许，天空下起了霏霏细雨。跟随张自忠多年的手枪营士兵，紧紧围护着总司令。他们面对步步逼近、怪声吼叫的大批敌兵，表现出惊人的镇定和勇敢，他们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肉搏战，将绝对优势的敌人阻于山脚下1个多小时。

战斗在雨中持续着，手枪营的士兵只有几个了。张自忠眼看着自己的弟兄一个个倒下去，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大吼一声，向敌人冲去，扣动扳机将几名敌兵击毙。就在这时，敌人的机枪向张射来，他身上数处中弹，右胸洞穿，血如泉涌。敌兵一窝蜂地冲上来。张自忠对身旁的人说：“我不行了，你们快走！我自己有办法。”大家执意不从，张拔出腰间短剑自裁。卫士大惊，急忙将他死死抱住。张自忠弥留之际，躺在地上，脸色苍白，平静地说：“我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你们快走！”此刻，敌兵已冲至跟前，张身边的两个卫士，一个被敌兵乱刀捅死，敌兵端着刺刀又向另一个卫士刺来。刹那间，张自忠双目圆睁，大吼一声，猛然站起，抓住敌兵的枪身，以自己的身躯挡住敌人的刺刀。突然，一颗子弹从他的胸部穿过。他向后一个踉跄，又一颗子弹从他的右额射入。这位怀着满腔热血、誓死忠心报国的抗日名将，身中7弹，再也支持不住，轰然倒下了。

张自忠牺牲后，右翼兵团失去统一指挥，战斗力大减。日军于5月31日强渡襄河，6月1日攻占鄂北重镇襄阳，6月12日，川东门户宜昌沦陷。

此后，敌我沿江陵、宜昌、当阳以北三线形成对峙，枣宜会战结束。这次会战，歼敌约2万人，中国军队伤亡2.8万人。

十二、举国同悲 痛悼忠魂

16日晚，我军得知张自忠总司令为国捐躯的噩耗，即派人寻找将军的遗体。18日上午，冯治安副总司令率总部人员和当地群众于快活林哭迎忠骸。李宗仁获悉张自忠壮烈殉国的消息，失声痛哭。张的老长官冯玉祥闻讯，悲伤至极。他说：“我读了这个电报真如晴天霹雳，震我肺腑，我不仅哀痛这位25年来共患难艰苦的老兄弟的死亡，更痛惜在此抗战的重要阶段上牺牲了一员大有作为的猛将，这真是全民族的重大损失！”

5月21日，张自忠的灵柩护送去重庆。下午3时许，灵车抵宜昌县境，湖北省代主席、边防军司令、宜昌警备司令等军政官员在城郊迎灵，举行了沉痛、肃穆的迎灵仪式。沿途许多民众自发加入了送灵队伍。突然，敌机轰鸣而来，在送灵队伍的上空盘旋吼叫。人们却不躲避，怀着悲愤的心情继续行进。自发送灵的群众越来越多，最后达到10万人。在将军灵车通过的道路两侧，摆放香案、花果，香烟缭绕，鞭炮轰鸣。有的人掩面而泣，有的人躬身拜揖，有的人挥动白色毛巾，还有的人匍匐在地，失声痛哭。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对这位民族英雄的崇敬之情。

由于沿途各地人民纷纷致祭、悼念，直到5月28日，将军的灵柩才抵达重庆。蒋介石、冯玉祥、孔祥熙、何应钦、孙科、张群、宋子文、于右任等文武官员，臂缀黑纱，肃立于码头迎灵，然后登轮绕棺致哀。蒋介石“抚棺大恸”，在场者无不十分悲痛。

28日下午3时，蒋介石率文武官员举行了盛大隆重的祭奠仪式，蒋亲自主祭，气氛庄严肃穆。当日，蒋介石还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通电全军，表彰张自忠一生的勋绩。关于张的抗战功绩写道：

追维荅忱生平与敌作战，始于二十二年（1933年）喜峰口之役，迄于今豫鄂之役，无役不身先士卒。当喜峰口之役，歼敌步兵两连队、骑兵一大队，是为荅忱与敌搏战之始。抗战以来，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而临沂之役，荅忱率所部疾趋战地，一日夜达百八十里，与敌板垣师团号称铁军者鏖战七昼夜，卒歼敌师，是为我抗战以来，克敌致胜之始。今兹随枣之役，敌悉其全力，三路来攻。荅忱在枣阳之方家集，独挡正面，断其归路，毙敌无算，我军大捷。假荅忱不死，则此役收效当不止此。

关于张自忠重返部队、参加抗战前与日本的关系，蒋介石是肯定、积极的评价：

其智深勇沉，则犹有世人未及者。自喜峰口战事之后，卢沟桥战事之前，敌人密布平津之间，乘间抵隙，多方以谋我，其时应敌之难，盖有千百于今日之抗战者。荅忱前主察政，后长津市，皆以身当樽俎折冲之交，忍痛含垢，与敌周旋。众谤群疑，无所摇夺，而未尝以一语自明。惟中正独知其苦衷与枉曲，乃特加爱护矜全，而犹为全国人士所不谅也。迨抗战既起，义奋超群，所向无前，然后知其忠义之性，卓越寻常，而其忍辱负重，杀敌致果之概，乃大白于世。

11月16日，国民政府在北碚双柏树雨台山，为张自忠举行隆重的下葬仪式，蒋介石、冯玉祥等高级军政官员参加。蒋很早就来到灵堂，伫立默哀，

并主持移灵祭祀。蒋率官员步行到墓地，命人在张将军的棺上覆盖青天白日旗。由蒋介石亲题的“英烈千秋”4字，刻石立碑，置于墓道。

张自忠殉国后，为避免影响全国抗战士气，未立即公开发表消息，直到该年7月7日，抗战3周年纪念日，才将此事公布。同日，国民政府颁布褒恤令，并追晋张自忠为陆军上将。

噩耗传出，举国痛悼。各地军政当局和广大群众纷纷举行隆重的悼念活动，甚至沦陷区人民也冒着危险暗中举行追悼仪式。

当年由于交通阻隔，通讯不畅，直到8月6日，延安才获悉张自忠将军殉国的消息。《新中华报》当天发表了《悼张自忠将军》的社论，指出：“张将军对抗战之功极大，今并以身殉国，将其最后一滴血献给了抗战，既成功又成仁，的确配称为炎黄的优秀子孙，模范的民族革命军人，流芳百世的民族英雄。”

8月15日下午，延安各界1000余人举行隆重追悼大会，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题写了挽词，分别是：“尽忠报国”、“取义成仁”、“为国捐躯”。朱德总司令敬献花圈，并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将士学习张自忠将军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怕死，不谋私，坚持团结，坚持抗战，为民族解放，为战胜日本侵略者英勇奋斗。

下面比较详细地引用本书开头，周恩来、冯玉祥对张自忠将军的评价，作为本书的结尾。

1943年5月16日，张自忠将军殉国周年纪念日，周恩来在《追念张荃忱上将》一文中写道：

张上将是一方面的统帅，他的殉国，影响之大，决非他人可比。张上将的抗战，远起喜峰口，十年回溯，令人深佩他的卓识超群。迨主津政，忍辱待时，张上将殆又为人所不能为。抗战既起，张上将奋起当先，所向无敌，而临沂一役，更成为台儿庄大捷之序幕；他的英勇坚毅，足为全国军人楷模。而感人最深的，乃是他的殉国一役。每读张上将于渡河前亲致前线将领及冯治安将军的两封遗书，深觉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1940年5月18日，冯玉祥得知张自忠壮烈殉国的消息后，在《痛悼张自忠将军》一文中写道：

抗战以来，以军团长兼集团军总司令，亲率队伍，冲杀敌人，受伤不退，力战身殉者，此为第一人。

复看中华民族四千年历史，抵抗外来侵略，以高级将领身先士卒，截击敌寇，终以鲜血溅沙场者，此亦为有数人物。

这样为抗战史上以鲜血的血，写出灿烂光华的一页者，我们要永远记在心头，永远父以告子，兄以告弟，这样的传至千秋万世，芳馨不灭。

